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7)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编

主 编：潘世伟 徐觉哉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7)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7/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 - 7 - 208 - 15010 - 2

I. ①世…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世界-2017-年鉴 IV. ①D507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2469 号

责任编辑 赵伟

封面设计 张志全工作室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7)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4.5
插 页 2
字 数 1,477,000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5010 - 2/C • 556
定 价 198.00 元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怀超 李兴耕 陈启懋 肖 枫 李其庆 郑异凡 周尚文
赵明义 赵 曜 奚广庆 高 放

主编：

潘世伟 徐觉哉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丽雅 王世伟 韦定广 方松华 王建民 孔寒冰 白平浩
许宝友 刘淑春 吕薇洲 轩传树 林德山 周穗明 俞思念
胡振良 徐世澄 党齐民 聂运麟 柴尚金 徐元宫 徐觉哉
蒲国良 蓝蔚青 潘世伟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庆 王 鑫 朱美荣 来庆立 陈祥勤 林颖峰 聂大富

序

王怀超^①

2012年以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两位资深学者潘世伟教授和徐觉哉教授主编并出版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这是由我国学者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汇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潮最新动态、反映本学科研究领域最新成果、文献资料丰富的工具书,也是我国学术界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学界的一件十分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值得庆贺。感谢潘世伟教授和徐觉哉教授以及所有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编辑工作的同仁们!

大家知道,年鉴是一种常备的工具书,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必备的工具书,而且是十分难得的工具书。而编写年鉴又是一项十分艰苦、十分繁重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坚韧的敬业精神,是做不下去的。记得江流老师曾两次嘱我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牵头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年鉴》,我们也研究讨论了几次,终因工程量大、找不到合适人选承担等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潘世伟教授和徐觉哉教授下决心创办《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而且几年下来,每年都能准时出版,其敬业精神的确值得称道,值得钦佩!诚望他们的这个研究团队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办下去,为深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2017年春,徐觉哉教授嘱我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7)》作序,非常感谢他的盛情邀请。我翻阅了已经出版的几本年鉴,有关编写年鉴的一些观点和建议,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都讲到了,我也没什么新的思想观点需要表述。下面,我想借这次机会,谈一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发展态势”这一主题。

我们知道,苏东剧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概括地说,苏东剧变引起的震荡、彷徨和混乱已经基本结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复苏,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



^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点,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左翼力量在对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行双重反思的基础上,从本国实际出发,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积极寻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新途径。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拉美左翼运动积极地推行“另一个世界”“替代资本主义”的新尝试;发达国家日益活跃的新社会运动以及苏联东欧地区方兴未艾的左翼运动不断对资本主义提出新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枝独秀,蓬勃发展,向世人展示了社会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预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广阔前景。认真地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准确地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既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也是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必需。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以来,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转变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二次”大战后,又由一国发展到多国,一度形成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被苏联称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上个世纪 60 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严重分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所谓“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历史性的低潮。依据是: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解散,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弦易帜,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欧洲共产主义消失;一些以苏联为榜样的发展中国家犹豫彷徨,开始寻找其他发展道路;另一种观点认为,苏东剧变表明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败。这种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找到自身的定位,是一段历史性的失误。具体情况是:原来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 15 个减少到 5 个(仅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共产党员的人数(除中国外)从 4 400 万人减少到 1 100 万人左右。应该说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挫折,教训极为深刻;第三种观点也是本人所持的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有着丰富的世界历史内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苏东剧变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或严重挫折。着眼世界历史,任何一种新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要经历一个探索、失败、再探索、再失败,直至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因此,在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或曲折是十分正常的历史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①,对于一个从事着伟大事业的民族来说,“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5 页。

② 同上书,第 560 页。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

1. 关于苏联东欧地区

苏东地区执政的共产党,有的进行了“社会民主党化”的改造,有的仍坚持共产党的称谓,部分继承了共产党的传统。俄共被视为“半社会主义党”,有苏共的一元主义转向多元主义,承认多党制、多种经济成分、多元思想、多种斗争方式。中东欧一些政党保留共产党的名称,反对完全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过去,但在党纲中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提法,只是一般性提“民主”“自由”“人道”“人权”的口号。^①从总体上看,随着苏东地区各国转型的完成,这一地区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方向基本确定,并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及活动方式,但还远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发挥政治作用。从力量的地区分布来看,自苏东剧变以来形成的共产党组织“东强西弱”、社会组织“西强东弱”的格局并未改变,而位于中间地带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影响都不大。

就苏东地区左翼力量的具体理论主张而言,由于要同选举政治保持一致,因而可选择的创新余地有限。为了更多的选票,其思想、纲领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现实、迎合选民。因此,其理论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必然减少,转而奉行政治现实主义,大多数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原有的反体制特征都在逐步减弱。值得关注的是,在左、右翼格局之外,中间派政党组织渐成气候,其同情者和支持者日益增多。尤其是在东欧国家,建立政党联盟和多党联合政府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还往往不是单纯的左左或右右联合,很多时候倒是左右的联合。这种现象再次表明,在当代,传统左、右翼的政治分析框架已经不合时宜了,因而在观察和分析时要从当地的客观情况出发,需要有更为开放的视野和思维。

2. 关于越、古、朝、老4国

越、古、朝、老4国仍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其发展道路上面临诸多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均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资料,越南、古巴、老挝2010年的GDP世界排名分别是56位、63位和134位,增长率分别是6.8%、2.1%和8.5%,越南和老挝的人均GDP为1224美元和1177美元,(世界银行尚未统计朝鲜数据)。其次,经济结构不合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而需要大量进口的粮食和食品价格却大幅度上涨。再次,贫富差距拉大。由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加。

二是周边关系趋于紧张。首先,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其次,朝核问题使朝鲜成为国际热点。再次,能源的抢夺,使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争端升级。^②

2016年,越南、老挝、朝鲜、古巴4国执政党,都分别召开了党的重要会议,不同程度地总结了本国

^① 于洪君主编:《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② 常欣欣、张丽琴:《金融危机后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社会主义发展态势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4期。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为各自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确定了更为明确的目标。但发展道路不会是平坦的。

3. 关于发展中国家

目前在亚非拉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发展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大行其道。这一地区社会党国际成员增多和分支组织的设立是一个具体体现。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亚非拉地区还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实践成功的案例。尤其是在非洲,多党制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动荡;在拉美,私有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在亚洲,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保障了大垄断集团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利益,贫困仍然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1964年人民行动党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党加入社会党国际,由于反对教条主义,加上不符合社会党国际的“民主”“人权”标准,次年被逐出国际。人民行动党没有照搬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它强调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自然也不能用西方的民主观理解东方的民主。新加坡要建立的是具有东方色彩的民主制度——虽然有议会民主的外观,但不排除使用各种手段挤压反对党的政治空间——目的是确保一党长期、稳定地执政。这个“民主”不太纯的新加坡反倒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这再次表明,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主义”才是正道。被称为“小国大政治家”的建国总理李光耀说,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他认为,英国式的反对党政治在第三世界行不通,实行的结果必然导致政治动乱。他还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合理与优势”的地方,不少人把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市场经济”。

二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拉美地区一批政治立场相对激进的左派政治家和学者近年来提出和倡导的新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德裔墨西哥学者H.迪特里奇和智利学者M.哈内克。H.迪特里奇的思想虽然逐步被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所采纳,但是最后各国的实践都遭到了他的批判,认为这些国家不是在走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很多观点也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整个理论与实践显得很混乱。H.查韦斯曾经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代表,但10年执政让他得到了两个极端的评价:来自社会中低层的民众赞誉他为“勇敢的改革者”,那些利益受损者则指责他是一个“彻底的独裁者”。H.查韦斯去世后,接任者是N.马杜罗,但他没有能力控制局势,2014年初一度内乱。2016年12月,“南方共同市场”4个创始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定”为由,决定终止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致使左翼政府深陷外交困境。加之该国经济连续三年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GDP增长率分别为-4.0%,-7.1%和-9.7%,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个国家中垫底,恶性通货膨胀局面难以遏制,N.马杜罗政府举步维艰。

2016年8月,巴西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罢免D.罗塞夫的总统职务,临时总统M.特梅尔得以“转正”,成为新任总统。一场旷日持久的议会斗争至此结束。有学者认为,D.罗塞夫的下台是巴西经济在世界经济长时间萧条大背景下持续下滑状况的“牺牲品”,这诚然是对她代表的工人党的打击,但并不代表“左”或“右”的较量结局,不应被看成巴西左翼政党的终结。^①尽管拉美政坛左翼占优势的局面保

^① 徐贻聪:《巴西左翼政党并未终结》,《解放日报》2016年9月2日。

持了一段时间,但其日益表现出常态化、多样化、温和化、非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的趋势,致使 2016 年以来各国右翼力量持续兴起,开始呈现出“右进左退”的态势,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4. 关于发达国家

当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主要分两种情况:一部分转向社民党,另一部分仍然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坚守社会主义方向,但一般不再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提民主集中制和国际主义。这些共产党组织人数很少,影响极小。^①

二是自 24 大以来,社会党国际对其理论纲领和政策主张进行了较大调整:在理论纲领上,主张发展新型民主、新的国际主义和团结一致的新文化;在经济政策上,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新方案;在组织机制上,注重机构内部的民主化建设,积极探寻发挥党员和基层组织活力的新路径、新方法;在社会基础和对外联系上,进一步向社会开放。以英国工党提出系统改革福利政策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西欧社民党试图将福利国家发展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结合起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之后,原民主德国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来又与联邦德国社会主义政党联合成立了左翼联盟,但因内部认识不一致,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党纲。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 月社会党国际与 4 年前出走的“进步联盟”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尤其是“进步联盟”这次“一大”完成了组织建构,正式宣布脱离社会党国际。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酝酿,社会民主主义开启了向“进步的社会民主”的转型。这次转型的动机是什么?“进步联盟”和社会党国际在价值和实践层面存在何种间隙?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可见,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陷入意识形态茫然状态,而社会民主党则陷入组织危机和执政危机中。

三是激进左翼的崛起,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剧烈的变革,并力求用创新的手段追求激烈的进步,已经成为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金融危机推动了欧洲激进左翼的发展,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摆脱危机的新主张,并将退出欧元区作为一种反制新自由主义的措施。同时,激进左翼所要解决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要把更彻底地促进社会民主、公平和正义与摆脱危机的措施相结合,以扭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主导作用。目前属于欧洲激进左翼的约有 60 多个政党和组织,其影响日渐增大。^②

5.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顶住了苏东剧变的风潮,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不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列宁没有解决或没来得及解决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难题,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模式”的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集中表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模式”显示出的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人类历史将以“华盛顿共识”为终结的 F. 福山,他

^① 于洪君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 页。

^② 李其庆:《“欧洲激进左翼”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年第 4 期。

在 2009 年变了调,反过来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不少西方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赞扬中国模式,譬如英国学者 M. 雅克认为,中国的制度不会统治世界,但会“坐上世界优秀文明前列的位置”;《大趋势》作者、未来学者 J. 奈斯比特 2009 年写了一本新书《中国大趋势》,预测了中国模式的十大趋势,认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 J. 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德国社会学家 H. 韦尔策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放眼全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全球化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大舞台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才真正开始,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全球化开启与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全球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趋势。近 500 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不断全球化,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全球化。

20 世纪末,在信息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下,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出现两个看似矛盾却又是现实的发展趋势,一是资本主义的再次崛起,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再崛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随着苏联集团在冷战中的失败和苏联模式的破产,原苏东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数十个曾经搞过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纷纷转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版图大大扩张了;其二,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摆脱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受到的控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类似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环境,于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蓬勃发展。

在资本主义再度全球扩张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开始相对衰落了。冷战结束后,一度认为“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胜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却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乃至陷入深重的危机。为了规避发达国家的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高环境保护、高劳动保护、高社会责任,资本由其本性使然,便大规模地撤出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从 1991 年到 2011 年的 10 年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G7)在世界 GDP 中的份额从 2/3 下降到不足一半,而“金砖五国”则从 7% 左右上升到 20% 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那么简单,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共生关系。19 世纪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世纪,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崛起的世纪;21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高涨,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

^① 于洪君主编:《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38 页。

的全球退缩。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衰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应该是好事,因为这使得资本主义运用国家力量围堵、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的能力下降了;但是对其国内左翼运动而言,则可能是坏事,因为资本主义更容易将国力衰落归因于国内的反抗运动。在欧债危机中,欧洲左翼并没有成为选举中的赢家,反而在一些国家退步了。

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全球发展。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开辟前进道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扩张也不例外。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必将在世界工人阶级规模空前扩大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就。当然,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任何思潮的区别在于,在历史规律面前它不是茫然的,而是需要把握时机、遵循规律、认清趋势、奋力推进。因此,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应该超越民族国家范畴,从全球视野思考社会主义运动,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趋势,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于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欧美新社会运动,也应该从全球化时代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去加以观察。

当前,“互联网+”与大数据正在迅猛发展,正在迅速地深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和正在颠覆金融业、保险业和传统商业。有人预言,“互联网+”与大数据有可能颠覆意识形态,颠覆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将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改变现存社会,也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此,要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反应敏锐,深入思考。

2. 多样性和多元化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常态

与 20 世纪相比,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日益多元化,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也更加广泛。一方面,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存在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民族或地域特点,各国都在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把“胡志明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同时强调“革新”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古巴共产党则在“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人民造福”的“三项原则”下,采取灵活政策,根据国内环境特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H.查韦斯声称,“崭新的、委内瑞拉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欧洲中左翼政党的主张则是带着深刻的基督教文明的烙印。这些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无一不是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发展和多样性模式。

首先,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是对苏联模式一统天下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来不是由历史发展的机械性、单线性来呈现的,而是以非均衡、非直线甚至复线和多样性的方式来呈现的。资本主义不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都表现为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相应的社会主义也必然表现为一种不平衡的发展,也就是

说,在特定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发展得快些,而在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发展得慢些;某种社会主义运动形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效果好些,而在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效果不怎么好。因此,就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图景而言,不同国家或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实践形式、不同的发展速度和不同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是一个长期、曲折、艰苦、复杂的历史探索过程。

3.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议题

从16世纪初产生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到19世纪中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再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围绕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展开的。但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之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

较早意识到了这一点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变成西方左翼政治流派中的主力之一。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认识。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科学技术造成的,但根源不在科学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这造成的必然结果便是掠夺自然、破坏环境、使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成为“商品化的自然界”和“军事化的自然界”。比如,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不到5%,却消耗了世界25%的能源、80%的原材料和86%的商品,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排放量的2/3。如果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标准,那意味着整个世界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将增加10倍,对矿产资源的消耗将增加大约200倍。况且,几十年内,这些数据又会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而翻一番。^①可见,如果全世界都像发达国家那样消费,整个地球将不堪重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是生产力提高很快,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贡献很大。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是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不全面,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是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而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生态社会主义者还反对任何战争,因为战争使用武器,会导致对环境的大破坏,所以绿党强烈要求大规模裁军,反对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反对战争。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者还批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他们指出,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能源产业迁往不发达国家,把有毒有害的工业垃圾向不发达国家倾倒,用污染其他国家的做法,为西方国家提供商品。在他们看来,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必须把那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唯一目标的政治思维,转变为以人类利益和全球安全为目标的新思维,坚决维护生态环境。

^① 转引自宾建成:《人本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道路》,《当代经济管理》2006年第28卷第4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4. 实现现代化成为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除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其余的大多数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即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与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可见，社会主义的真正对手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社会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最庄严的承诺，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如果社会主义能实现自己的承诺，资本主义就不是对手，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就永远无法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初期曾经表现出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惊人能力，也因此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二战”后进入高潮。但是苏联模式仅仅适用于部分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长期没有找到持续快速协调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模式，使得苏联模式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最终导致国家解体、执政党消亡。而世界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重新看到曙光，恰恰因为中国、越南乃至巴西等国家的探索，打败了“社会主义不善于发展生产力”的流行观念，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强有力的新模式。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得以实现，那么改变的不仅是世界现代化的图景，更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图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有可能发生历史性逆转。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尽管我们严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界定在中国甚至中国大陆，尽管中国早已彻底放弃“输出革命”，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国道路的巨大生命力，已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延伸到了国门之外，这是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持续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还有希望在未来一二十年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并将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国家现代化。到那时，中国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一个民族国家的快速发展并不奇怪，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将近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讲，人均指标虽然不高，但中国的人口数量决定了它的总体分量。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共有 6 亿多人口脱贫，联合国在 20 年内的脱贫人口中，中国占了 70%。中国人均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增加到今天 74 岁多，城镇化率已达 57%。按照这个发展势头，再过 30 多年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回首历史，在 200 多年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几个主要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人口总数不过 12 亿，而中国将在 100 年的时间里，带领 15 亿人口进入现代化。因此，中国的进步将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阶段性标志，必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显著变化，不仅足以令国人树立起民族自信，而且也将使国外许多有识之士产生认同，这种认同将有可能引导一些国家借鉴中国经验走向符合该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

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其速度,更在于其规模。30多年来,中国经济规模从世界大国的最后一名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政治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快速扩大,也伴随着中国政治和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扩大。从社会主义角度看,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本身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中国影响力的快速扩大本身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影响力上升。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良好的发展趋势。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意义在于,它来自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文明类型,却获得了巨大成功。近代以来,西方人创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显著成就,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和巨大实力,从而坚定了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西方人普遍认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他们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是最好的,是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因此任何民族和国家必须效仿西方,他们甚至采用军事干预迫使他国进入西方文明。所以,对于世界上属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讲,中国道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即不简单照搬或直接移植西方模式,而是在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道路的特点和成就形成了对欧洲中心论及西方模式的挑战。中国道路的非西方特质必然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许多西方人士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剧变的原因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共产党没有能力治国理政。但是,无论怎样指责和批评,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领导力量,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非欧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走自己的路也可以实现现代化,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出的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他国家不能简单模仿,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是可以借鉴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含的核心理念,体现了现代价值,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如“以人为本”“社会公正”“人民民主”“共享共富”“包容开放”“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理念,在国际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感召力,正在逐步改变20世纪一些国家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世界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正面形象。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楷模。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从理论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大格局中进行思考,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概括并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项战略任务。

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走出了因苏联东欧剧变而导致的巨大困难,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缓慢复苏,在总结经验、改革调整中奋力前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显著成就,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预示了社会主义的广阔发展前景。

第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显著特点是:独立自主、多样性和多元化。一方面,思想来源日益多元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广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实践形式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民族性或地域性特点。世界各国执政的和没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从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一种常态,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发展态势。

第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潮和流派众多,复杂多样,但影响广泛的主要有四个学派:一是民主社会主义,二是生态社会主义,三是民族社会主义,四是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加强对这4个主要学派的研究,尤其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研究其思想来源、学科性质、理论形态、基本范畴、世界意义等。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的巨大成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力也已延伸到国门之外,成为不少国家参照的方案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是,就是说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50至70年。”^①“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人民只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还是要靠实践的成功来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经做了初步的证明。

第五,要充分尊重各国政党和人民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既然多样性和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常态,那么就要充分尊重和维护这一客观现实。我们应牢固树立充分尊重各国政党和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一个国家做出怎样的选择,是这个国家的政党和人民自己的事,自己最有发言权、最了解本国情况,他国不应干涉,我们也绝不干涉他国内政、强加于人的事。这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早在1982年,我党就在十二大报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② 同上书,第38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告中指出,各国革命“只能是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我党进一步把“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确立为党同外国党处理党际关系的4项原则。苏东剧变后,面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局面,邓小平为我们确立了“韬光养晦”“绝不扛旗”“决不当头”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的基本国策,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①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江泽民进一步强调指出:“世界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

在世界社会主义流派众多的今天,我们应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承认并支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发展。当前“大左翼”既包括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还包括多种社会主义模式。除了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之外,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如拉美有委内瑞拉已故总统H.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R.科雷亚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巴西劳工党提出的“劳工社会主义”等。此外,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力量也在复苏。对世界上某些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流派,可以考虑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的“朋友和伙伴”对待,逐步扩大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借鉴,又可以结交更多有影响的左翼朋友。^③朋友总是多一些为好。

总之,应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承认并支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发展视为历史的进步,视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所在。我们应当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发展,不扛旗,不当头,不向他国推广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由各国自己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世界最终向什么方向发展,应由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和世界人民的选择来决定。^④

2017年11月29日于北京西郊永存斋

① 同上书,第363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③④ 于洪君主编:《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6页。

2017 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徐觉哉^①

回首即将过去的 2017 年,我们目睹了 D. 特朗普的上台、美俄关系的恶化、“伊斯兰国”组织的垮台、欧盟与英国“脱欧”的扯皮、朝鲜半岛关系的剑拔弩张、恐怖爆炸连连的欧洲、中东局势的波诡云谲、种族冲突与枪击案频频的美国……,使人难以感受到和平年代应有的安宁。环顾全球,反建制主义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国际关系正从多极转向多元而混乱的体系,主要国家内部的共识和凝聚力已经出现严重断档,政治恶斗和社会撕裂一再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势不两立”,这很可能是现代国际政治新保守主义的变现。当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西方文明被异质化后,党争民主的政党背后不只是同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而是不同的族群、宗教,这样党争民主最终变成了族群、教派之间“文明的冲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争民主直接诱发了西方文明的溃败。我们看到,危机后的 10 年中,极右翼势力把自己打扮成紧缩政策、欧洲一体化、民主体制和全球化的受害者,继而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同流合污,将开放、包容、多元视为欧洲各国面临诸多危机的根源,尤其是对外来移民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不满,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感召力,使地缘战略和国际规则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进一步加剧了不稳定的态势。世界的发展演变是否预示着人类社会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基本格局、秩序和规则是否面临新的变局?尚待进一步观察。

或许面对西方世界的混乱和失序,《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的纪念,再次引发了各国关于马克思理论贡献是否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当下社会危机的讨论。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逐渐将这部鸿篇巨制遗忘,然而直到今天,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能够忽视《资本论》的重要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